2026年11月15日 星期日 老年日报

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张天龙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mb2014@sina.com

“把警队里那些没被看见的人写进时代”

民警作家吕铮:在预审室与稿纸之间

当大多数刑侦故事还在迷恋惊天大案、天才神探的时候,吕铮的写作,扎根在警界最朴素的褶皱里。他不是站在外面眺望警营的旁观者,他本身就是其中一员:一线民警,曾随猎狐缉捕队奔赴海外,亲手触摸过跨国追逃里的泥泞、妥协与坚持。办案的笔录、预审室的沉默、老刑警藏在皱纹里的疲惫,这些旁人难得一见的片段,最终都慢慢流进他的长篇小说。

公安文学长久以来常常陷入两难:要么沦为宣传范本,人物完美无缺;要么滑向猎奇,靠血腥刺激攫取眼球。吕铮试图走出第三条路。他笔下的警察,会倦怠,会纠结,会在规则与人情之间反复掂量。《三叉戟》里三位老去的老刑警,没有光环加持,他们面对新技术感到吃力,要应付体制内的细碎约束,也守住刻在骨血里的底线。正是这份不回避缺陷的书写,让这组形象跳出荧幕,成为近年国产叙事里少见、能够被记住的警察群像。

如今,他笔下已经攒出一个“警察宇宙”:经侦、猎狐、刑警、预审、“字警”、特警……一部接一部被改编搬上荧屏。

二十余年,二十部长篇,奖项接踵而至:茅盾文学新人奖、金盾文学奖、徐迟报告文学奖,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奖。荣誉确认了他在文坛的位置,但他并未把写作当成脱离警队的跳板。办案是写作的源头,写作又是他安放职业感受的出口。猎狐行动里的跨国追逃,催生同名纪实作品;预审这个少有人关注的岗位,在《名捉》中被细致剖开,让读者看见,侦破不止追捕,还有语言、心理、耐心之间漫长的博弈。



从一首歌开始

被称为“公安作家”或“警察作家”,吕铮不太乐意,他觉得自己就是业余写作,“当一爱好”。他从不在上班时间写小说,可还是遭到同行非议,说他不务正业。

在警察队伍里,吕铮就像《藏锋》里的谭彦一样,算是个“异类”,体能不算太好,文笔却相对出名。2000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领导挨个问新来的有什么爱好,他说“我爱好写歌”,屋里哄堂大笑。

这种格格不入从16岁进警校就开始了,男孩们大多练拳击、打篮球,而他写歌,不少人奚落称,“你一个‘武夫’,怎么还舞文弄墨。”

不过吕铮没打算改,那年全校合唱节,他写了队歌,词曲和指挥都是他。上台前,他借了套合身的警服,戴上一双白手套,站在千人大礼堂的舞台上,底下“哗”地全在问“谁啊谁啊”。后来曲子拿了全校第一,队主任拿着白板把歌词喷绘在宿舍楼道里,一届人看了四年。17岁,他又写广告歌挣了1700元,于是拿着这笔“巨款”请全队吃饭,食堂酱骨头五毛钱一根,他把一盆全包了,同学扑上来抢,“那场面像放出去一群猎狗”。

工作后,吕铮用业余时间写作,第一本小说《黑弈》成了。稿子是他一家家出版社敲门投出去的,有一次见到一位副总编辑,对方趿拉着拖鞋,听这个年轻警察讲了一个多小时案子,把稿子收下,说稿费只能按字数算,几千块。吕铮说行,有钱就给钱,没钱不要钱也出。样书到手那天,他抱着几本,在朝阳门外的街上狂奔,“仿佛世界都亮了”。

2011年,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给全国公安系统第一个培训名额,单位推荐了他。但回来后,曾经接手的案子都被分走了,他只好今天跟这个组,明天跟那个组,两年时间里也抓获了22个犯罪嫌疑人,立了二等功。

但他依然被冠以“字警”头衔,常有人说,“案子还没破完,他出什么小说啊”。每到职业生涯关键节点,这种声音都会更大。

找机会擦亮自己

2014年分水岭到来,吕铮写作这件事终于可以摆到台面上来。

生日那天,他成了公安部猎狐行动宣传组的成员。但刚开始,许多大案,通讯稿只能写两百多字。他主动请缨写报告文学。由于保密原则,他提议把劝返、缉捕的案例时间模糊、人物化名,然后写成连载。

时任领导放手让他干。吕铮就给自己定下规矩,日常工作照做,但每周一篇五千字,一篇都不能少。这是他给自己“码的活儿”,写的是命题作文,什么是缉捕,什么是劝返,什么是引渡,什么是自首;各国、各省要平衡,每位队员也要平衡。

有时凌晨两三点,境外工作组落地,吕铮也跟着到办公室听汇报,听乌干达的风土,听菲律宾的街景,听那些从没上过新闻的细节。很多国外城市他没去过,就问队员们当地到底什么样,当地人穿什么,街上有几辆车。靠着这些零碎描述,加上媳妇买的旅游杂志,吕铮在稿子里把街景一点点拼出来。

两年多时间里,吕铮写下四十多万字,连载六七十篇,《法制晚报》、凤凰网、《啄木鸟》杂志每周等着刊载。白天参与抓捕,写所有归国人员的简报、文书以及通讯,剩下能写报告文学的时间只有两天,写完还得走流程,报领导、审核、脱密。他后来把这段时光比作《七龙珠》里的精神与时光屋,“就是修炼啊,进去一天就是外边一年”。

写作发生在一切缝隙里。从成都押嫌疑人回京,乘火车30个小时的路途中,两个老民警轮着睡,吕铮睡不着,干脆掏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写。对面就铐着犯罪嫌疑人。

“一生中擦亮自己的机会,可能就那么几次。”吕铮认为自己把握住了机会。2016年离开猎狐办之后,他学会了在任何条件下按任何要求写。审查、脱密、命题作文、门类平衡,这些曾让他痛苦的规矩,把他从一个凭兴致写作的作者磨成了职业写手。

很快,吕铮用年假时间写完《三叉戟》,三个快退休的经侦老警察,浑不吝,相互算计,遇事又拧成一股绳。那是他结束“功能性写作”后第一次写自己想写的故事,也是首个他参与编剧并上了卫视黄金档的故事。

拿惊险奇特当糖壳

作品登上荧屏之后,他几乎很快就发现不对劲。

前些年现实主义题材大热,影视从业者一窝蜂地上。有次参加作品改编会,刚走到门口,就听见平台的人和制片人商量,说他写的案子跟时代不接轨,干脆换成当时的一个重大事故。他一进门就冷了脸,问他们该事故归哪个警种管?“刑警不管,归应急管理部,移送了犯罪归治安,治安不预审。”吕铮说完,对方不说话了。

吕铮的素材全从现实里来,这也是他最较真的一条:故事得在现实里站得住。他不愿意重复,也不能接受委托创作,不按别人的大纲写。

他曾经办过一个经侦案件,一个家境贫寒的人职务侵占数目颇大,钱放着也没怎么花,审讯时他对吕铮说,北京太大了,他之所以做这些事,“只是想找点存在感”。曾有刑警对吕铮提及自己办的大案,顺口说出一句,“刑警就是行”。

每年,吕铮采访不下几十个人,同行、朋友、当事人,聊出来的金句记在手机备忘录里。小说《小人物》里,“职业闭店人”的情节只有五千字,但他为此采访了十多个人。“什么叫职业闭店人?(当时)新闻报道里没有,百度百科里没有。我凭什么让读者掏钱买我的书?凭的就是这些从生活里捞出来的信息量。”

台词有时甚至是吕铮自己“演”出来的。碰到人物对话,他可能会空出那一千字,等第二天送完孩子步行去单位,就一路开着讯飞语音,一人分饰两角即兴演绎,聊到兴头上一两千字,回去把口语修改成书面语,“聊出来的台词,比坐在电脑前写出来的精彩”。

吕铮的故事不写宏大叙事,他只从“人”出发。

《无所遁形》写一个外号“瞎猫”、眼神极差的警察,在电子监控、天眼追踪的年头,偏要用传统跟踪手段干掉高科技;《大风暴》以坏人为主视角,“你们玩血腥暴力,我玩不见血的罪”,吕铮说,书里一个扛下八条人命的杀人犯,其实“只”杀了一个人,还是自己至爱的人。

“拿惊险奇特当糖壳”,他说自己写作,是要让人吃着糖,快吃完才发现里面略有一点苦涩,“哦,那是人性和时代”。

汪畅

新闻+1

吕铮:想写一部反着的《亮剑》

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警察作家,吕铮深感一线警察的日常与大众认知之间的温差。“我从不觉得荣誉是什么高大上的词汇。”他直言,对于从业二十多年的他来说,英雄主义不是惊险奇特的枪战,而是无数个平淡无奇的坚守。当他采访那些受重伤的同事时,发现他们甚至无法描述搏斗的细节,因为那是“日常”。

这种“日常”中隐藏着巨大的职业素养。吕铮在创作《打击队》和《三叉戟》时,故意避开了那些追求表面感官刺激的血腥暴力桥段。他认为,真正的强情节在于人物关系和内心的博弈,“不动声色中,泰山震动。”他偏要在那种所谓“不被看好”的小案件中,去挖掘保民生的深意。他曾将《三叉戟》的成功归结于“不迎合”。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观众爱看动作大片、爱看血腥暴力,但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,写三个老警察的经济犯罪侦破。

“我想写一部反着的《亮剑》。”不同于军人在战场上的“明知不敌也要亮剑”,吕铮认为警察的智慧在于面对复杂的态势进行有效的处置,“藏而不露”的智慧便是其中之一。

吕铮给自己的定位是:“我就是一个业余时间从事创作的业余作者。”但他所说的“业余”,并非指写作水准,而是一种创作态度。正是这种态度,让他得以在面对审美疲劳时,依然保有敏锐的选择力。他从不愁素材,平时与一线同事的交流、实地采访以及对案例的细致搜集,使他拥有一个巨大的“公安题材故事库”。他有一套独特的筛选逻辑:做出大纲,搁置一两年,如果直到动笔前还能对这个故事感到“眉飞色舞、手舞足蹈”,那才是真正值得写的故事。

综合